

经济学 是科学吗？

现代经济学的
成效、历史与方法

Science?
or
Ideology?



[英]罗杰·P.巴克豪斯
●译
Roger P. Backhouse
●著

The
Puzzle
of
Modern
Economics

经济学 是科学吗？

现代经济学的
成效、历史与方法

Science?
or
Ideology?



[英]罗杰·E.巴克豪斯
Roger E. Backhouse
●译
苏丽文

The
Puzzle
of
Modern
Econom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是科学吗?现代经济学的成效、历史与方法/(英)罗杰·E.巴克豪斯著;苏丽文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432-2816-0

I. ①经… II. ①罗… ②苏…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217 号

责任编辑 张宇溪

封面设计 三 喵

经济学是科学吗?

——现代经济学的成效、历史与方法

[英]罗杰·E.巴克豪斯 著

苏丽文 译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173,000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16-0/F · 1078

定 价 48.00 元

推荐序

这是一本出自经济思想史家之手，并结合 20 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史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一旦涉及方法论问题，往往让人敬而远之，这个领域确实过于艰深。但这本书并不烧脑，甚至不必正襟危坐读之。之所以能把复杂的方法论问题简单化，并且写得引人入胜，除了作者力图“让本书的主要观点……以非经济学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现给读者”^①之外，还与作者本人有关。

本书作者罗杰·E. 巴克豪斯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是当今经济思想史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治史者著书立说喜欢“寓教于史”，治思想史者也不例外。他们在论证自己观点时选择的史料本身往往就足够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作者的学术身份决定了这本书的风格。此其一。其二，巴克豪斯个人的观点较为中性，从而没有太多说教，让观点各异的读者可以相对平和地阅读，不至于产生抵触进而弃读。正如他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历史故事综合起来，进行修正和放大，并告诉世人，这些故事如何嵌入一个范围更广的故事情节当中。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既不会是保守的（为现代经济学的成就而喝彩），也不会是革命

^① 见本书“致谢”第 1 页。

性的（为了推翻当代正统思想而揭它们的伤疤）。”^①这种态度对于涉及方法论问题的著作尤为必要，因为在方法论领域，不同阵营的经济学家更容易剑拔弩张。

方法论对于任何学科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但主流经济学对它却不怎么待见。乔治·斯蒂格勒曾告诫同行，60岁以前别去碰方法论问题。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说方法论领域难度太大，没必要把青春耗费在这上面。但在我看来，这种告诫另有深意：对于按主流经济学标准程序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一旦过早进入方法论领域，很容易对自己笃信的学说产生怀疑，于是信念动摇，即便不至于改弦易辙，至少思想上也会彷徨痛苦，所以干脆别去碰。待年纪差不多了，还有兴趣的话再去琢磨，到那时，个人思想的一切改变都无关紧要了，而且也不容易改变了。这或许也是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方法论（和思想史）缺位的原因之一吧。

方法论真有那么“可怕”吗？是的。正如本书讨论的话题：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试问，按照主流经济学标准程序“生产”出来的经济学从业者，有几人会质疑经济学不是科学？在主流经济学的圈子里，如果否认经济学是科学，那么“你作为经济学家的资格就会让人怀疑”。^②但是在方法论领域，关于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这本讨论方法论问题的书，就是对这个争论的生动呈现。

^① 罗杰·E.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355页。

^② 见本书第68页。

经济学中的争论司空见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争论算是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争论了。不过这种争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内部矛盾”。尽管我们看到了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炮轰宏观经济学，看到了保罗·罗默“叛出师门”这类“大事件”，但这些人和事只不过是自家兄弟之间出现点不愉快而已。克鲁格曼攻击的对象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则是自己搞了个模型来替代他认为错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罗默不过是抱怨团结在罗伯特·卢卡斯周围的那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不带他玩。这样的争论不是这本书关注的对象，它关注的是经济学“灵魂深处的斗争”（struggle over the soul）。^①

经济学中还有这样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它的“斗争”“资产阶级”之类的用语在西方的经济学界不是几乎绝迹了吗？沉浸于主流经济学者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他们了解的是被有意无意屏蔽了的经济学信息，因为他们没有涉足真正的方法论领域，接触到的最多是“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经济学”这种方法论伪命题。这样的“斗争”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书中谈到的“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便是一个事例。^②有关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是这种“斗争”

^① 这是尤沃·约纳伊（Yuval Yonay）1998年出版的一部记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制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间的争论的著作的书名：*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s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也译“后我向经济学运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运动今日已发展成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运动”。

的集中体现。这个争论的完整表达应该是：“主流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维护者认为它已经是科学，反对者认为它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维护者和反对者分别来自经济学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如果不了解非正统经济学，甚至不知道非正统经济学的存在，自然就会不承认或者不知道经济学中还存在斗争，只会认为“（正统）经济学的批评者们根本不了解这门学科”。^①

来自非正统经济学阵营的批评者并非天外来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他们和正统经济学家一样，都是由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对主流经济学的掌握程度与正统经济学家无异。他们由于师承关系或者别的偶然因素，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思想史、方法论，从而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等非正统经济学学术传统，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因此，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更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正因为更了解，他们看得到这门学科的问题和缺陷，看得清这门学科的本质。只不过他们受到正统经济学圈子的排斥、打压甚至迫害^②，成为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所屏蔽的对象，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非正统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是全方位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层面，到理论、方法和政策，两个阵营截然不同。这两个

^① 见本书第3页。

^② 弗雷德里克·李（Frederic Lee）的《非正统经济学史》（*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9）详细记载了英美两国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在整个20世纪的艰难境遇。

阵营的对立通过本书中的一段叙述可见一斑。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这个问题，正统经济学阵营中的计量经济学的看法是：“富有科学性就是要通过严谨的方法得出研究结果，就是运用数学方法获得比运用文字分析方法可能得到的更加严谨的结论。科学严谨性意味着逻辑严谨性，要求经济学应关注准确定义的数学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因此，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就是要简化问题，将它们用公式表述出来，形成几组方程式，从而可以用合适的数学方法加以操作。”而在非正统经济学阵营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具有科学性意味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更多、更可靠的经济观察，获取定量数据；拒绝接受理论的一成不变，允许经验观察……对理论进行检查和检验；要有理性，不感情用事，尽可能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运用与相关领域科学知识相一致的行为或动机前提，尤其是心理学；创建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①

判断这两种认识孰优孰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经济学并非只有一种声音。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接触另一种声音的机会。读者不一定会接受这种另类声音，但兼听则明，它或许有助于读者认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为改进这种经济学做出贡献。当然，这本书也有可能就是让某些读者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家的那个偶然的机会。如果是这样也不可怕，多元化比一元化更有利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

对于后一类读者来说，这本书只是为你们接触非正统经济学打开了一条门缝，不妨把一些已在国内出版的书籍当作通向非正

^① 见本书第 119—120 页。

统经济学殿堂的阶梯。^①

张林谨识

2018年1月

zhanglin0997@vip.sina.com

① 这些国内出版的非正统经济学著作包括：菲利普·奥哈拉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杰弗里·M.霍奇逊著《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能动性和达尔文主义》；马克·R.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一卷)；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马克·拉沃著《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霍华德·谢尔曼著《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

致 谢

撰写这本书花了很多时间。起初的想法是通过对经济学近期（自二战以来）历史的叙述，写一本阐明经济学现状的书。我曾希望能够利用过去十年里在这方面所做过的研究工作成果，快速准备出一本书。然而，尽管很快拼凑出了草稿，但是却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写作就被搁置下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其他项目，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不能将收集到的各种素材按我所希望的方式编排在一起。打过多次草稿之后，终于有了这个结果，原稿中的多个章节被砍掉，由新的内容所取代，留下来这本既涉及方法论又涉及历史的作品。

尽管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经济学界的辩论，尽管我能理解我表达的看法背后蕴含的那些经济学方法论文献中的观点，但是我决定要让本书的主要观点能够而且因此应该（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以非经济学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如果这一初衷被证明过于乐观，那么对于在遥远的过去学过经济学入门课程的那些人，书中的主要思想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请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在我解释他们会觉得非常基础的材料时要有耐心。与此同时，非经济学家们将遇到抽象的材料，我提请这一类读者设法看到任何难于理解的理论思想背后的画面。

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相继得到很多人的慷慨帮助，才使本书得以完成。他们中有些人的著述使我形成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其中我想特别感谢已故的鲍勃·科茨（Bob Coats），没有他的

鼓励与劝导，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开始思考这些作为本书写作起点的问题。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和凯文·胡佛（Kevin Hoover）对书中介绍的有关实证研究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乌斯卡利·梅基（Uskali Mäki）和马塞尔·博曼斯（Marcel Boumans）编辑的论文集对本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引述本身可能反映出来的。

我能够从初稿进展到现在的终稿，主要原因是我得到读者们强烈的批评。马克·布劳格、凯文·胡佛、史蒂文·梅德马（Steven Medema）及两位匿名读者，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布拉德利·贝特曼（Bradley Bateman）对主要章节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与我讨论了其中的许多观点。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和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也对某些特定的章节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然而，我在学术方面 [非学术方面要感谢我的妻子安（Ann），对任何一个曾花去那么长时间去写一本书的人来说，家人的付出都是不言而喻的] 主要感激我的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斯科特·帕里斯先生（Scott Parris），他极富耐心，不止对一稿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还指导我重新调整书稿结构。同时，也感谢史蒂文·梅德马与我一同讨论我们共同撰写的论文中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我们主办了一个有关经济学家与市场的长期研讨会，主要围绕他最近出版的新书《犹豫之手》（*The Hesitant Hand*），还有我们一直在一起做的研究。他不仅对整个书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阅读了几个章节的多个版本，设法（尽管不能总是成功）对我进行匡正。

罗杰·E. 巴克豪斯

2009年11月

目 录

第 1 章 导 言	001
第一篇 经济学的作用	
第 2 章 创建新市场	026
第 3 章 创建市场经济	045
第 4 章 全球化与福利	061
第 5 章 货币与金融	087
第二篇 对经济学的历史考量	
第 6 章 创建“科学的”经济学	119
第 7 章 探求严谨的宏观经济学	141
第 8 章 科学与意识形态	165
第 9 章 另类见解与非正统经济学	185
第三篇 评 价	
第 10 章 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神话	204
文献注释	229
参考文献	232

第 1 章 导 言

为什么谁都没有看到它的来临？

2008 年 11 月 5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经济学院参加一栋新建大楼的落成典礼。当谈到信贷危机时，她转过头来对在场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这糟透了。为什么谁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新闻记者则毫不客气，更为直言不讳地谴责经济学家。在曾任《泰晤士报》(Times) 经济学栏目编辑的阿纳托尔·卡莱茨基 (Anatol Kaletsky) 看来，“经济学家是罪魁祸首”。(2009 年 2 月 5 日《泰晤士报》)。《卫报》(Guardian) 经济学栏目编辑拉里·埃里奥特 (Larry Elliott) 断言：“作为一门专业，经济学不仅对什么原因导致世界走到金融崩溃边缘这一问题无言以对，而且也极为缺乏兴趣”(2009 年 6 月 1 日《卫报》)。在同一份报纸上，西蒙·詹金斯 (Simon Jenkins) 撰文将这一失察归咎于“经济学家将无所顾忌地为政府提供其想要听到的政策建议视为己任……这个现代职业团体说，不要搬弄是非，这样才能确保得到指数化退休金。”他指出，整个经济学界已“陷入崩溃”(2008 年 11 月 2 日)。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学界已经走

入歧途。曾在一些世界顶级经济学系——麻省理工、耶鲁和普林斯顿——度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赞同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和金融家、银行家及政策制定者都同样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他评论道，“经济学界之所以步入歧途，是因为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将披着光鲜的数学外衣的美误认为是真理”（2009年9月6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这一指责不可轻视，因为克鲁格曼要指出的是，不仅经济学家犯了某些错误，而且他们的失误深深地根植于经济学界的核心价值观。

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反映的不只是在英国，也包括美国、欧洲，而且毫无疑问，还有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大多数国家，人们普遍持有的态度。此次失误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政策失误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新闻媒体对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负面的报道。然而，仅在那之前的几年，它所呈现给公众的形象却是迥然不同的——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洋溢着自信的——学科形象。经济学曾是破解万事之谜的钥匙，正如出现在书摊上的诸多书名所显示的那样：《长明灯：经济学如何照亮世界》（*Everlasting Light Bulbs: How Economics Illuminates the World*, Kay, 2004）、《怪诞经济学：一位另类经济学家对事物不为人知的一面的解释》（*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ain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Levitt and Dubner, 2006）、《性越多越安全：经济学中的非传统智慧》（*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 Landsburg, 2007）、《生活的逻辑：包罗万象的新经济学》（*The Logic of Life: The New*

Economics of Everything, Harford, 2008)、《经济自然主义者：经济学为何几乎能够解释一切》(The Economic Naturalist: Why Economics Explains Almost Everything, Frank, 2008)。

在对待经济学的态度上发生的这种改变不足为奇。驱动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再回到繁荣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在繁荣时期，人们可能将深奥难懂的事情，比如信用违约掉期、债务抵押债券或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留给专业人士来办理，相信他们了解自己在做的工作。只有在出现问题时，人们才发出质疑之声，并要求对动用纳税人数十亿美元、欧元和英镑的资金支持金融系统做出解释。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批评并非始于 2007 年 7 月至 9 月的银行业危机。远在此之前，对经济学的不安就由来已久。因此，黛安娜·科伊尔 (Diane Coyle)，前英国《独立报》的经济版编辑、《性、毒品与经济学》(Sex, Drugs and Economics, 2004，这本书秉承“经济学是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之衣钵) 的作者，看到了弄清是非曲直的必要性。从她第二本书的标题可见，经济学并不是“沉闷的科学”——它是《触动灵魂的科学》(The Soulful Science, 2007)。她在该书中阐明，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革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去设计最终使贫穷成为历史的政策，并有意回避了在前一本书中倍受欢迎的主题。她认为，经济学的批评者们完全不了解这门学科。

科伊尔的目标读者是她称之为“政策知识圈”的群体，该术语描述的圈子包括《纽约时报》、《卫报》或法国《世界报》(Le Monde) 评论专栏撰稿人，还有出自政策智库或在美国《新共和》(New Republic) 或《国家》(Nation) 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

作者。在使经济陷入衰退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她的主张可能显得过于乐观，尽管如此，她的许多观点都切中要害。然而，她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对经济学予以批评的人并不都是新闻记者；他们还包括经济学界的内部人士——不赞同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经济学与经济的对峙》(*Economics Confronts the Economy*, 2006)。在这本书中，菲利普·克莱因(Philip Klein)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参与了兜售一成不变的自由放任主义世界观的活动。他认为，经济学的面孔未有改变是因为学院派经济学受制于顶级学院（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等）的一小撮经济学家，这些人负责主要期刊的编辑工作，扮演着阻挡新思想出现的角色。克莱因指出，该学科的大部分研究所具有的特点是使经济学琐碎化(trivialization)，且不顾为其付出多少代价，只一味地追求风格优美。如果我们到别处看看，就会发现富尔布鲁克的《经济学之乱象指南》(*A Guide to 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 Fullbrook, 2004)，在该书中，有多达27位作者撰写的文章，记述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存在的各种根本性缺陷；或者斯蒂文·马格林(Steven Marglin)的《沉闷的科学：经济学家的思维如何逐渐削弱社会》(*Dismal Science: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 2008)，从其书名即知其主题思想。这些书都是在附和许多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深信，大多数正统派同僚们正在将经济学带入歧途。

那么，聪明智慧、显然是博学识广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抱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换言之，为什么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该学科正在成功地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另一位则认

为这个学科是在致力于建立抽象的、脱离现实世界的理论学说？如果要弄清现代经济学的意义，就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若知这一讨论的来龙去脉，就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并非经济学所独有，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经济学比自然科学表现出更多的异见。物理学家可能质疑宇宙是否始于一次“大爆炸”或对如何解释重力持不同见解，生物学家可能对具体的进化过程有不同观点。这只不过是说在科学领域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类争论是在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框架内进行的：物理学中的定律不能被轻而易举地否定（尽管偶尔也可能从某个新视角来看待它们）；在生物学中，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是不容质疑的，尽管对进化的方式可能还在争论之中。但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且仍未得到解决。社会科学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不断演变、形成人们以不同方式相互影响的制度的方式，意味着社会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赖以存在的、牢固的实证基础。

尽管如此，经济学还是有些与众不同。这一领域一直有着比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更强的学科认同，对其学科核心内容由何构成，有更加一致的意见。在这方面，它比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大对手更加接近自然科学，比如心理学。心理学具有所谓的“多变认同”（protean identity）：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包括难以协调一致的方法，如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在学科内部，对一些（对外人而言）基本的东西，如“心灵”（the mind），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同样，对于社会学，尽管有些人主张将其视为最主要的社会科学，但它的多样性，甚至使任何人都可以质疑是否有可能谈论单一的社会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中包含的多种